

三十四名被授予“工艺美术家”称号的技艺人员获得荣誉证书和奖章奖金

南京将兴建大型旅游饭店

酃县按照自然规律和经济规律

调整农业内部结构 农副工业综合发展

本报讯 记者刘光解、通讯员曹榜平报道：近两年，湖南省酃县的农业发展较快，粮食生产平均每年增长了百分之十六，林、牧、副、渔增长了百分之二十以上。去年，每个社员平均纯收入由一九七六年的七十四元提高到一百一十四元多，成为湖南省社员纯收入较高的县份之一。今年，这个县的春粮、油菜籽和早稻都增产了。县委书记彭物苟说：这些成绩，主要是因为解放思想，按自然规律和经济规律，逐步改变农业内部比例不协调的结果。

地处井冈山西麓的酃县，是革命老根据地，境内“九山半水半分田”。早些年，毛主席领导的事实求是，从实际出发，发展优良传统和作风，在酃县得到发扬，山区经济建设发展很快。可是，在文化大革命中，由于林彪、“四人帮”极左路线的影响，一些同志片面强调粮食生产，把利用山区资源发展多种经营视为“以副伤农”的“资本主义”，不仅粮食上不去，而且还严重影响了林牧副渔的发展和社员生活。一九七一年到一九七六年，全县粮食总产量在一亿一千斤左右徘徊，社员纯收入由八十四元下降到七十四元。打倒“四人帮”以后，县委带领七十名干部发扬当年红军“日穿草鞋干革命，夜走山路访贫农”的精神，爬山涉水，分头深入到全县十六个公社实地调查，广泛听取群众意见。社员们反映：这些年，只准种粮，是一条腿经济。我们酃县吃亏就吃在“单打一上”。县上根据调查的情况，作出了“坚持农、林、牧三结合的原则，走农、副、工综合发展的道路”的决定，发动干部群众，自下而上地制订出农林牧副渔的发展规划。

要改变十多年形成的错误观念很不容易。有些同志怀疑：这样搞方向对不对？有人心有余悸，怕重新戴上“以副伤农”的帽子。针对这些思想，县委在大队以上干部会上，引导大家讨论农村工作的出发点是什么？是让集体和社员富起来还是穷下去？并积极推动广东公社东风大队农副工综合发展由穷变富的经验。县委运用实践中经验教训，帮助干部肃清极左路线的流毒，统一思想认识。大家说，发展生产，增加收入，让集体和社员富起来，是我们工作的出发点，过去那种“以粮为纲，全面砍光”的蠢事不能再搞了！

各地办场、办厂、发展多种经营的积极性起来了。但是，新的问题出来了。如有的公社不问经济条件和猪苗、饲料来源，一轰而起办“群众猪场”。县委九名常委分头到这些公社，用过去不从实际出发办企业的教训，帮助公社的同志端正思想认识，强调因地制宜，就地取材。在提高认识的基础上，县委发动各大队对本地农业资源和自然资源作全面调查。根据山区木材多、石头多、坡地多、溪流多的特点，办起了小水电、木材加工厂、水泥厂、小煤窑等厂矿企业，并建起了二万七千多亩桑、果、药、茶等经济作物基地。去年，全县社队企业和多种经营收入达九百五十四万多元，比一九七六年增长一点三倍，为发展农业生产提供了二百多万元资金，促进了粮食生产的发展。

酃县有一些暂时难以改造的低产田，究竟如何利用好？县委认为，必须讲求经济效益，允许生产队因地制宜地改种计划得来的经济作物。中村公社心田大队桥生产队，一九七七年将十亩“望天田”改种桑树，当年种桑养蚕，收入二千五百多元，比种稻谷多收一千九百多元。在林业方面，这个县改改造、轻管、轻视经济林为重造、重管、重视经济林。县委领导成员带领干部群众上山造林，使森林覆盖面积占到山地总面积的百分之八十九。县委对群众造林、收益大的三十二万多亩油茶林，紧紧抓住不放，发动群众复垦。去年，全县茶油总产量达到一万一千五百多担，比一九七六年增长六倍多。

在调整中，酃县县委还注意帮助社队解决劳力、资金、技术等一系列具体问题。他们根据全县每个劳力平均负担四亩田田和经营项目多的实际，拿出一定的劳力从事社队工业、畜牧业和经济作物生产；为解决资金困难，这两年，县委每年从县机动财力中拿出十五万多元，帮助社队解决发展经济作物的种子、种苗问题；为了提高科学技术水平，培训多种经营技术力量，他们从外省聘请了七十多名种植桑、果、药、茶、烟等方面的农民技术员，为全县训练植保队伍。

肃清极左路线流毒 落实三中全会精神

小平易公社用实践检验思想和政策是非

本报讯 通讯员杨泰、耀文、文显报道：夏收以来，山西朔县小平易公社党委组织部干部卜真理标准讨论这一课，用实践来检验思想和政策是非，把人们从极左路线枷锁中解放出来，进一步扫清了落实党的三中全会精神的思想障碍。

为什么担心害怕

小平易公社贯彻落实三中全会精神和中央关于发展农业生产的两个文件以来，各方面都起了很大变化，夏季丰收，各种秋熟作物长势好；全社工副业生产形势喜人，上半年收入达到一百多万元，相当于去年全年的水平。但是，在这样大好的形势下，仍有少数干部存在着糊涂认识：一是害怕。害怕政策改变，再吃苦头。看到一些大队因搞工副业多收入几个钱，就说方向偏了；二是担心。觉得生产队有了自主权，给了社员自由，群众难管，工作难做，主张收小账。甚至有极个别的干部把农村出现的一些问题，归结到三中全会制订的政策上。这种情况说明，有不少干部至今没有摆脱极左路线的框框。

为了帮助干部解放思想，肃清流毒，落实三中全会精神，公社党委决定在干部中开展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讨论，联系本地实际，进行典型对比，帮助干部澄清一些大是大非问题。

让实践来回答

生产队自主权到底是多了

还是少了？就拿种植农作物来说，前几年，公社为了图好看，在种植上搞“一律化”。尤其是在公路两侧，搞“千亩方”，不管适宜不适宜，每年硬性规定种玉米。结果茬口不能倒换，施水困难，种一年败一年，群众越种越灰心，造成全社粮食产量连年下降。今年，生产队根据本地性、茬口和水肥条件，在这些“千亩方”里因地制宜种上了谷子、高粱、山药等作物，看上去五花八门，实际上门门生长旺盛，群众劳动的积极性更高了。事实说明，不是生产队自主权多了乱套，恰恰是少了才导致瞎指挥。“一刀切”实际上，现在有些连队这点种植权还没有，更没有上其他自主权了，政策刚刚开始落实，怎么就多了呢？

上级指示也要实践

检验

在农村工作中，往往出现上级领导的意见同实际情况相矛盾的情况。公社党委要求用干部的亲身教训，帮助干部分清界限，正确对待上级领导的意见。这个公社的祝家大队，一九七五年粮食产量就达到了四百一十三万斤。后来上级领导在这里蹲“点”，把外地的许多具体做法都搬到这个队试行，先是搞“过渡”，随后在劳动管理上搞“大概工”，在粮食分配上搞“自留口粮”。试来试去，把群众的积极性“试”光了。粮食产量不断下降，去

变“坐商”为“行商” 打开产品销路

北京第三无线电器材厂主动作社会调查，根据用户需要增产产品

据新华社北京电 北京第三无线电器材厂打破过去坐等用户上门订货的习惯，变“坐商”为“行商”，主动到用户中去推销产品，迅速打开了销路。

北京第三无线电器材厂的产品是无线电元、器件。今年这个厂的生产任务不足，国家下达的全年生产任务只相当于去年实际完成任务的百分之七十三。全厂干部和工人对这种状况十分焦急。在年初召开的厂职工代表大会上，代表们建议：打破过去坐等用户上门订货的老习惯，在完成国家下达生产任务的同时，主动走出去，调查社会需要，充分利用现有的生产能力，增产那些社会急需的产品。厂领导立即采纳了群众的建议。今年上半年，他们先

后派人到一些省、市的单位，调查对无线电元、器件的需要情况，按照用户要求，签订了大量合同，有的产品订货量比国家计划增加了几倍甚至几十倍，由原来的“吃不饱”变为“吃不了”。对设备部和人力，他们也根据用户的需要进行了必要的调整，今年上半年已经从长线产品的生产线上，调整出一部分设备、劳动力，开辟了三条新的生产线，增加了社会急需产品的生产能力。

北京第三无线电器材厂还把组织出产品生产，作为打开产品销路的一个重要途径来搞。今年年初，这个厂获悉香港一家公司需要一种无线电元件，便主动要求外贸部门帮助联系，向这家公司

签订了十几万只这种无线电元件的出口合同。由于千方百计推销产品，北京第三无线电器材厂已扭转了因任务少而造成的被动局面。目前这个厂所承接的订货合同已超过全年国家计划的百分之二十以上。

这个厂还主动派人到外地联系，带了一批新产品样品，深受用户欢迎，已经签订了一批产销合同。近四个省的物资部门签订了价值二十多万元的加工订货合同。这样，上半年本厂自加工的产值已达到了百分之五十七。

在保证按质按量完成军工生产任务的前提下

北京五二九厂生产民用产品

据新华社北京八月十一日电 生产军工业产品的北京五二九厂，利用本厂有利条件积极研制、生产民用产品，今年已陆续生产了计量表、双柱塞微量泵、测计、高频中电压标准、标准电压源等多种民用工业和服务行业用的产品。这些产品很受用户欢迎。

五二九厂设备好，技术力量和生产能力都较强，但是生产任务一直饱满。去年，他们根据军工业要“军民结合”的精神，生产了一部分民用产品，效果较好。今年，他们决定在保证按质按量

续生产一些市场上急需的民用产品。到目前止，全厂已安排了地震四配器、心脏监视仪、糖果包装机、自动化养鸡设备、大型高压锅、切皮革机、食用消毒器、人造关节等十几项民用和出口产品，还接受了一百多个零星加工项目。

五二九厂在组织民用产品的生产过程中，十分注意质量，做到了不合格的产品决不出厂，出厂的产品包退、包换、包修。由于这个厂产品质量好，已开始

完成军用品生产任务的前提下，广开门路，继

续生产一些市场上急需的民用产品。到目前止，全厂已安排了地震四配器、心脏监视仪、糖果包装机、自动化养鸡设备、大型高压锅、切皮革机、食用消毒器、人造关节等十几项民用和出口产品，还接受了一百多个零星加工项目。五二九厂在组织民用产品的生产过程中，十分注意质量，做到了不合格的产品决不出厂，出厂的产品包退、包换、包修。由于这个厂产品质量好，已开始

据新华社成都电 重庆中南橡胶厂在生产任务不足的情况下，千方百计找米下锅，开展来料加工等业务，变“吃不饱”为“吃不了”。今年上半年，这个厂完成产值和上利税分别比去年同期增长百分之十九和百分之十四，各项主要经济技术指标都创造了历史最高水平。

这个厂的任务只够他们“吃”，国家给这个厂的原料不够，国家给这个厂的品种他们只需半年就可以干完。职工们认真分析研究了面临的这种状况，认为本厂的产品，许多生产单位是很需要的，因此，就不能坐在那里等吃现成饭，应该积极开动脑筋走出门去“找粮食”。厂领导先后派出了二十多人次，到本部和邻近省份去调查研究，了解市场需要，并请用户来厂参观，主动介绍本厂的生产情况。很快打开了销路，也找到了一些原料和半成品用的橡胶制品。一席带过去，这些厂都知道了中南橡胶厂能生产什么，许多厂带着原料到厂来加工，许多厂需要一种吹氧胶管，目前全国只有一家工厂生产，常常供不应求。今年上半年，中南橡胶厂为一些糖厂和橡胶厂试制成功了带胎和吹氧胶管这两种产品，并且很快投入了生产。除此以外，他们还生产了橡胶加工用的风筒带、进口化肥装置上用的异型运输带等十七种新产品，深受用户欢迎，已经签订了一批产销合同。

这个厂还主动派人到外地联系，带了一批新产品样品，深受用户欢迎，已经签订了一批产销合同。近四个省的物资部门签订了价值二十多万元的加工订货合同。这样，上半年本厂自加工的产值已达到了百分之五十七。变“等米下锅”为“找米下锅”，是一部分企业贯彻国民经济调整方针，发挥企业自主权，产销结合，把生产搞活的一项重要措施。现在有些厂矿企业，由于原料、材料、燃料不足，或产品需求量有限，生产任务满足不了现有的生产能力，使劳力、设备闲置，造成很大浪费。要解决这个问题，一方面，有关部门要进行调整和整顿；另一方面，这些厂矿企业要改变“坐在家里等吃现成饭”的状况，开动脑筋，对社会需要进行深入调查，充分利用现有的生产能力，增产人民急需的产品。这方面介绍的三个工厂，都是在生产任务不足的情况下，走出厂门“找粮食”，不仅扭转了生产被动局面，而且较好地发挥了现有有人力、设备的作用，使生产有了发展。这种为四化争作贡献的精神，值得学习。

——编者



来信

编辑同志：

锅炉是重要的工业设备。无论是发达的工业国家还是我们国家，都将它当作一种特种工业，对其结构设计、加工工艺、制造、安装、修理的质量控制，运行管理等方面，制定了国家标准和管理法规。由于林彪、“四人帮”极左路线的干扰、破坏，

工业锅炉的制造必须整顿

我国工业锅炉制造管理比较混乱。大批非专业锅炉制造单位，制造了大量的质低、价贵、不能确保安全运行的工业锅炉；同时，个别专业锅炉制造厂，有忽视质量、粗制滥造的现象，生产了一些不符合国家标准的劣质锅炉。

现在，全国除了一百多家专业锅炉制造厂外，还有大批非专业锅炉制造单位。据辽宁、河南、山东、北京四个省市不完全统计，非专业制造单位达二百余家之多。有个省的一个公社，就有社办企业、学校、生产队等十多个单位加工制造锅炉。这种混乱状况，给国民经济的发展带来极大的不利。

第一，浪费国家大量钢材。目前国内工业锅炉的钢耗量，一般为每吨蒸发量（锅炉出力）用钢四吨五吨；而绝大多数非专业制造单位生产的锅炉钢耗量，都远远超过这个水平，有的每吨蒸发

量耗用钢材高达十多吨。第二，爆炸事故不断发生，危害人民的生命安全，损坏国家财产。非专业锅炉制造单位绝大多数缺乏必要的设备、技术力量和检验手段，有些锅炉没有安全阀、压力表、水位表等附件就出厂了，因此给安全运行带来了先天的隐患。有一台由非专业锅炉制造单位造的工业锅炉，运行不到两个月，就发生爆炸，炉体飞出几百米远，并引起了厂房着火。

第三，浪费燃料。多数非专业锅炉制造单位生产的锅炉热效率仅百分之四十左右。据统计，全国工业锅炉的总容量达二亿吨。如果我们的工业锅炉达到先进的热效率标准，一年就可节煤几千万吨。

我们认为，上述问题应引起国家有关部门的注意，并采取迅速措施。

李毅 刘福仁



编后语

工业锅炉质量的好坏，关系到人民的生命安全、工交事业的发展 and 钢材、燃料的节约，应该引起充分重视。目前，锅炉生产计划不周，质量低劣，非专业锅炉制造盲目发展，专业制造厂“吃不饱”，以及制造厂多，修理厂少的现状，急需改变。凡是不具备生产条件的，不应继续制造。有的可安排修理和制造锅炉附件，有的需要关、停、并、转。一定要严格按照国家规定的标准，保证产品质量，并实行包修、包换、包赔的办法。今后制造的锅炉，如因质量问题，造成人身伤亡及重大经济损失，应认真追究责任。

执行合同 兑现政策 取信于民

后河公社夏季丰收后，按照“五定一奖一罚”的合同规定，及时进行奖金实物奖励兑现

据新华社郑州电 新华社记者尹道夫报道：河南省长葛县后河公社在夺得今年全年夏季丰收后，层层召开“五定一奖”兑现大会，按照作业组同生产队签订的“五定一奖一罚”（定生产、劳力、投资、报酬、超额、减产奖励、减产受罚）的合同规定，及时进行奖金实物奖励兑现。他们首先超额完成了国家

粮食征购任务，增加了集体储备粮，提高了社员口粮标准；然后按照超额奖励的提成比例，拿出四万四千多元现金和三十万斤小麦，分别发给先进集体、劳动模范和模范干部。全组十八个大队，一百一十多个生产队，九百零六名大队、生产队干部和七千五百六十名社员获得了超产奖；因减产而受罚的

有九十五名干部。当人们看到获奖的社员和干部们双手接到奖金和扛回一袋袋小麦时，激动地说：俺们农民有奔头了，农业有奔头了，四化有盼头了！今年，这个公社的干部、社员战胜多种自然灾害，夺得了小麦丰收，单产和总产都达到历史最高水平。这时，超产队最高兑现年初按照作业组同生

产队签订的“五定一奖一罚”的合同规定，减产单位则不想兑现，而有些干部有意见，不敢兑现。是朝令夕改，撕毁合同？还是坚决兑现，取信于民？

后河公社召开公社党委扩大会议和队干部会进行讨论。大家说：我们共产党人应该说到做到，才能取信于民。思想统一后，全公社迅速掀起了实物奖励兑现热潮。

在“五定一奖”兑现中，后河公社注意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帮助增产队总结增产经验，帮助减产队吸取减产教训。

一九五四年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的人民检察院组织法，确立了我国社会主义的检察制度，对于指导各级人民检察院的工作，维护社会主义法制，起了重要的作用。林彪、“四人帮”出于篡党夺权的政治阴谋，疯狂叫嚷并且实行“砸烂公检法”，使检察工作中断了近十年之久。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粉碎“四人帮”之后，把重建检察机关、作为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一项迫切任务，同时，经过二十多年来的实践，我们对于检察工作已经有了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因此，已有必要和可能对原来的人民检察院组织法进行修改。在五届人大常委会法制委员会的支持下，经过有关方面的共同努力，圆满地完成了对人民检察院组织法的修改工作。人民检察院组织法系统地规定了检察机关的机构设置、性质、任务、权限、工作程序以及组织原则和工作原则，是检察机关行使职权的法律依据和贯彻执行的章程。我们必须认真学习 and 贯彻执行，为维护社会主义法制而斗争。

坚持检察机关法律监督的性质

人民检察院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它依照法律规定，检察国家机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和公民违法犯罪的案件，其中包括叛国案、分裂国家案以及严重破坏国家的政策、法律、法令、政令统一实施的重大犯罪案件，代表国家提起公诉，支持公诉，并且对于公安机关侦查的案件进行审查，决定是否逮捕、起诉或者免于起诉；对于公安机关的侦查活动、人民法庭的审判活动以及监督、看守所、劳动改造机关的活动是否合法，实行监督，以保证正确地打击敌人，惩罚犯罪，保护国家的利益和人民的权利。二十多年来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表明，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对于维护社会主义法制，是非常重要的，不可缺少的。什么时候加强了法律监督，法制的状况就比较好一些，打击敌人就比较准确一些，违法乱纪和错捕、错判就比较少一些；什么时候削弱了法律监督工作，法制的状况就比较差一些，在对敌斗争中往往伤害好人，或者放纵敌人。这就充分说明，无产阶级不仅必须有自己的法律，而且必须有自己的法律监督机关。当然，国家的法制状况不完全决定于检察工作。但是，法律监督总是起重要作用的因素之一。林彪、“四人帮”别有用心地把法律监督和无产阶级专政对立起来，肆意诬蔑检察机关是“凌驾在党政之上的官僚机构”，攻击检察监督是“束缚专政手段”，从而把法律监督划为禁区。针对林彪、“四人帮”的干扰破坏，新的人民检察院组织法旗帜鲜明地重新肯定了人民检察院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赋予它维护社会主义法制的重要权限，为检察机关恢复了名誉。

法律监督越是有力，法律越是能够得到统一的、正确的实施，无产阶级专政就是巩固的。反之，取消法律监督，就是剥夺无产阶级专政中维护社会主义法制的武器，就会削弱无产阶级专政。同时，加强国家机关内部的法纪检察，促使干部严格守法，依法办事，对于加强党和国家统一集中的领导，维护统一的国家法律，密切与人民群众的联系，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根本不存在什么“凌驾在党政之上”的问题。相反地，削弱法律监督，必然破坏统一的领导和统一的法

为维护社会主义法制而斗争

黄火青

律，给阶级敌人和坏分子以可乘之隙。当前维护社会主义法制的障碍，主要地也还在于林彪、“四人帮”的恶劣影响和流毒还没有彻底肃清。这主要表现在因受他们的毒害而滋长起来的个人特权，因受他们的煽动而泛滥起来的无政府主义思潮，特别是由于他们结帮拉派而膨胀起来的派性的干扰。站在派性立场的人，以我划线，不顾大局，只认派别，不认法律。属于他这一派的人，即使严重地触犯了法律，成为凶恶罪犯，也要千方百计予以开脱和包庇；对于反对他这一派的人，即使是真正的受到冤屈，也不肯予以平反或者不肯予以彻底平反。这种派性，带有很大的封建性，是一种封建的利害结合。反对派性对法制的干扰，既是维护法制的斗争，也是保障人民民主的斗争。我们必须继续肃清林彪、“四人帮”的种种流毒，坚决揭发和批判派性，排除各种干扰，冲破一切阻力，坚持开展法律监督工作，为维护社会主义法制，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而斗争。

坚持正确的组织原则，保证法律

监督职能的实现

组织原则是实现政治任务的保证。检察机关要实现法律监督的职能，必须有正确的组织原则作保证。在这方面，我们也经历了一个实践和认识的过程。在建国初期，检察机关实行双重领导的原则，即地方各级人民检察院受本级人民政府的领导，同时受上级人民检察院的领导。一九五四年宪法规定，地方各级人民检察院只受上级人民检察院的领导，并且一律受最高人民检察院的领导，而不受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的领导，这就是垂直领导的原则。一九七八年的宪法规定，地方各级人民检察院对本级人民代表大会负责并报告工作，上级人民检察院监督下级人民检察院的检察工作，而不实行领导。检察机关的领导关系经过几次变动，证明双重领导的原则，即地方各级人民检察院既受上级人民检察院的领导，又受同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它的常务委员会领导，是比较适合我国的情况的。毛泽东同志在《论十大关系》一文中指出：“我们的宪法规定，立法权集中在中央。但是在不违背中央方针的条件下，按照情况和工作需要，地方可以搞章程、条例、办法，宪法并没有约束。我们要统一，也要特殊。为了建设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必须有中央的强有力的统一领导，必须有全国的统一计划和统一纪律，破坏这种必要的统一，是不允许的。同时，又必须充分发挥地方的积极性，各地都要有适合当地情况的特殊。”这次修正通过的人民检察院组织法，就是根据这一精神，确定检察机关实行双重领导的原则。

国家的检察权是统一的国家权力的一个方面，具有较大的集中性。各级检察机关应当在本行政区域内

畅通无阻地行使自己的权力。下级人民检察院在办理重大案件中，如果遇到特别复杂的情况和特殊困难而难以行使权力时，上级人民检察院可以及时予以指示和支持，必要的时候也可以把案件调上来自己办理，务求彻底揭露犯罪分子，予以应有的惩处。如果上级人民检察院对下级人民检察院不是实行领导，而只是实行监督，那末上级人民检察院就不能实行这样的集中指导，因而就会影响检察机关依法独立行使职权，影响法律的贯彻实施。所以，把一九七八年宪法规定的上下级检察机关的监督关系改为领导关系，是完全必要的，是前进了一大步。为了巩固国家的统一领导，人民检察院组织法把检察机关、分裂国家案以及严重破坏国家的政策、法律、法令、政令统一实施的重大犯罪案件，列为检察机关的首要职权。同时，组织法又规定，地方各级人民检察院的检察长、副检察长和检察委员会委员经地方国家权力机关选举和任命后，要报上级检察机关报经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实行在民主基础上的集中。这些规定，都是为了维护法制的统一，是符合我国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和当前斗争需要的。

如果说，检察机关的双重领导原则体现着国家体制上的民主集中制，那末，各级人民检察院设置检察委员会则体现着检察机关内部的民主集中制。我国检察机关从开始建立的时候起就设置了检察委员会，而不是实行总检察长的独任制。但是，在一九五四年的组织法中，规定检察长领导检察委员会的工作，没有充分体现民主集中制的精神。这次修改通过的人民检察院组织法，把原来的检察长领导检察委员会的工作，改为检察长主持检察委员会的工作，实行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进一步体现了民主集中制的精神。这就能够保证在充分发扬民主，集体讨论的基础上，对重大案件和重大问题作出正确的决定。

坚持对任何公民在适用法律上一律平等的原则

个人特权，是维护法制的一个严重障碍。一九五四年年的人民检察院组织法，也规定对任何公民在适用法律上一律平等。但是，由于当时特权现象很明显，我们还没有充分认识这一原则的重要意义。林彪、“四人帮”大搞个人特权、践踏法制和民主的严重教训，才使我们深刻地认识到对个人特权的极大重要性。因此，在人民检察院组织法中明文规定：“各级人民检察院行使检察权，对于任何公民，在适用法律上一律平等，不允许有任何特权”。在我们的法律上，明文规定反对特权，这还是第一次，具有极大的现实意义。当前个人特权的主要表现是，有些人在生活上豪华腐败，享乐成风，慷国家之慨，破坏财经制度，达到犯罪的地步；在政治上以功臣自居，藐视国法，认为法律只是管老百姓的，管不了自己这样的“大人物”。同时，这些人又把自己当作法律的化身，把自己的话

当作金科玉律，谁违背自己的话，就是违法，顺之者昌，逆之者亡。这种搞个人特权的入，实际上已经蜕化变质，倒退到封建主义去了。不克服个人特权，民主和法制不能加强，四个现代化不能实现，而且党和国有变色的危险。因此，反对个人特权，是维护社会主义法制，保障人民民主的一场严重斗争。检察机关必须具有大无畏的、不惜以身殉职的革命精神，不畏权势，不徇私情，执法不阿，上下一律，把反对个人特权的斗争进行到底。

依法独立行使检察权，忠实于法律和制度

在一九五四年年的人民检察院组织法中，是把独立行使职权作为垂直领导的原则来规定的。新的人民检察院组织法规定检察机关实行双重领导的原则，这里的独立行使职权已不是作为垂直领导的原则，而是作为法制原则规定下来。这就是：“人民检察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检察权，不受其他行政机关、团体和个人的干涉”。这一规定，同样具有很大的现实意义，因为，现在事实上就存在着干扰检察工作的现象。检察机关如果不能独立行使职权，而任凭别人左右和干涉，就不可能忠实于法律和制度，忠实于人民利益，忠实于事实真相，因而也就不可能忠实履行自己的神圣职责，特别是不可能进行反对个人特权的斗争。因此，是否坚持独立行使职权的原则，不仅是能不能正确处理案件的问题，而且是直接关系到能不能保持人民检察院制度的性质的重大问题。

坚持依法独立行使职权的原则，同加强党对检察工作的领导，是完全一致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现着无产阶级的意志和党的政策，执行法律也就是执行无产阶级的意志和党的政策，依法办事，保证严格依法行政，正是加强党的领导，而不是削弱党的领导。所谓依法独立行使职权就是“依法抗冤”的说法是毫无道理的。中国共产党是全中国人民的领导核心。党责成检察机关的党组织和党员忠实地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国家的法律法规，经常检查执行的情况；为检察机关挑选、输送优秀的干部；提高他们的政治觉悟和业务本领，把他们培养成刚正不阿、不惜以身殉职的检察员。这样，既保证了检察机关应有的独立性，又加强了党的领导。决不能把党的领导理解为要事事干涉，包办代替检察机关的具体业务工作。各种案件应由检察机关独立自主地办理。

当前，我国的阶级斗争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阶级斗争已经不再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但是，在我国还有反革命分子和敌特分子，还有各种严重破坏社会主义秩序的犯罪分子和蜕化变质分子，还有贪污盗窃、投机倒把的新剥削分子，还有极少数没有改造好的地主富农分子和其他旧剥削阶级的残余，还有“四人帮”帮派的某些残余，他们还会继续坚持反动立场，进行反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活动。同时，国内阶级斗争又同国际阶级斗争密切联系着。因此，我们决不能麻痹大意。对于当前的阶级斗争，必须按照严格区分和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的方针去解决，必须按照刑法、刑事诉讼法和其他法律的判决去解决。这就迫切需要加强检察机关，健全检察制度，为维护社会主义法制，保卫四化建设而斗争。

重证据 不轻信口供

陈一云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三十五条规定：“对一切案件的判处都要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不轻信口供。”在办案中切实遵守这个规定，就能有效地防止偏听偏信，主观臆断，保证对案件事实作出符合客观实际的结论。

审判、检察、侦查人员要全面认识客观案情，就应深入实际，依靠群众，从每个案件的具体情况出发，去收集能够反映犯罪的时间、地点、手段、过程、后果、动机、目的等的一切证据。只有取得了反映案件各个方面的充分的材料，才能了解案件事实的全貌，分清是非轻重，正确判决谁是犯罪分子，犯了什么罪，罪行是轻还是重，应不应追究刑事责任等问题。所以刑事诉讼法规定：人民检察院对公安机关移送起诉或免于起诉的案件，人民法院对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的案件，都应查明证据是否充分。

收集证据一定要有事求是的态度，注意正反两方面的材料。能证实被告人有罪和罪重的证据，要收取；能证实被告人无罪和罪轻的证据，同样应该注意收取。如果事实为主，只收取那些符合自己愿望和需要的材料，而不管与自己设想相反的证据，必然会产生片面认识，造成被告人无罪受罚或产生不当的后果。对于任何证据，在收集时都可按照其本来面貌提取，如实记录，决不可弄虚作假，任意歪曲。

为了保证取得符合实际的证据，保障公民的合法权益不受侵犯，收集证据必须按照法定程序进行。如询问证人和被害人，只能个别地进行，不仅询问笔录应当由他们核对无误后签名或者盖章，而且在询问时，还应告诉他们作证、诬告或者隐匿罪证要负的法律責任。进行搜查，应当有被搜查人或者他的家属和见证人在场，搜查的情况应当写成笔录并由有关人员签名或者盖章。在搜查中发现了可以用作证据的物品和文件，需要加以扣押时，应当会同在场见证人和被扣押物品持有人查点清楚，开列清单，并由有关人员签名或者盖章。同时，刑事诉讼法还明确规定：“严

禁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必须保证一切与案件有关或者了解案情的公民，有客观地充分地提供证据的条件”。如果审判、检察、侦查人员不顾法律的尊严，实行刑讯逼供，不仅应依法对其追究刑事责任或者给予行政处分，而且这样取得的“证据”，也是非法的，无效的。

办理刑事案件时收集的各种证据，往往很复杂，不仅有真的，也可能有假的；有的互相一致，有的却互相矛盾；有的与案件事实有直接的联系，有的则是间接的联系；有的有肯定的作用，有的却属于否定方面的。同时，对任何证据的判断，都同肯定或者否定一定的案件事实相联系，直接关系到能不能正确认识客观案情。所以，对证据进行审查，既要针对各种证据的特点逐个分析研究，又要将各个证据联系起来考察，加以对比、印证，看它们反映的情况是否一致。在它们存在矛盾的时候，应分析产生矛盾的原因，通过进一步讯问、调查来获取新证据，求得正确的解决。在案件中存在正反两方面证据的情况下，无论肯定哪一方的证据，都应当有足够的根据和理由来否定相反方面的证据，才能使被肯定的证据较不推，推不翻，具有说服力。在各个证据互相协调、一致的时候，还应考虑它们之间是客观上的联系，本质上的—致，还是表面现象上的联系，假象上的一致。只有经过这样周密的分析研究，才能识别假象，去伪存真。

对于物证，要研究它是怎样在什么地方发现的，收取的方式是否正确，有没有发生变化，是否有伪造的可能，它的存在和外部特征反映了什么案件情况。对于证人证言则要研究证人是怎样知道案件事实的，在他所谈的那种时间、地点、条件下，能不能看到和听到，有无错误，前后谈到的情况是否有矛盾，证人同当事人有无恩怨和利害关系，询问证人的方法有无问题等。不仅各种证据需要研究的内容有所不同，就是同一种证据，也应针对各个证据的具体情况，从实际出发，抓住应当着重

审查的方面。

在人民法院开庭审理的时候，一切可能用作定案根据的证据，都应当当庭审查。物证应当出示给被告人辨认。未到庭证人的证言笔录、鉴定结论、书证和勘验、检查笔录，应当当庭宣读，听取当事人和辩护人的意见。出庭的证人陈述证言以后，公诉人、被告人和被告人、辩护人双方都可以发问、质证。对出庭的鉴定人，也可以向发问。在法庭上把各种证据都亮出来，当众审查，让双方提发问，发表意见，进行辩论，就可以充分揭露矛盾，有利于发现问题，辨明真伪，对于全面查清案情，保证人民法院作出正确的判决，具有重要的意义。

刑事诉讼法规定，被告人的供述和辩解，即被告人人口供，经过审查核实，确实可靠，能够证明案件真实情况的，可以用作认定案件事实的一种根据。这是因为，受到刑事追究的被告人，对于自己有没有犯罪行为，如果犯了罪，是怎样进行犯罪活动的，都比别人更清楚。他供述罪行，就能详尽地提供犯罪的动机、目的、手段等与案件有关的其他情节。他的反咬控告，提出对自己有利的真实根据，就有了具体的反面情况。不管被告人人口供的内容是供还是辩解，对于审判、检察、侦查人员全面分析案情，深入开展调查研究，都是有利的。因此，重视审讯工作，采取正确的审讯策略和方法，使被告人提供符合实际的口供，是完全必要的。

长期审讯实践证明，犯罪分子除投案自首的以外，通常都不会轻易供述自己的罪行。他们通常是在感到罪状已暴露，抵赖不掉，或者有了悔悟，才开始据实供述。被告人供述罪行，可能有避重就轻的情况，还有为了掩盖同伙，而将别人的罪行承担下来的。如果被告人指供、诱供、胁迫逼供，他很容易胡言乱语，招供并不存在的“罪行”或者不是自己犯下的罪行，或者把好人诬指为共犯。所以决不能认为被告人供认有罪，就错不了，就可以相信。

被告人的辩解同样很复杂。犯罪分子为了掩盖罪行，推卸罪责，往往要虚构情节，歪曲事实，狡辩抵赖，千方百计为自己辩解。对此必须保持警惕，掉以轻心就可能上当受骗。但是，无罪的人也可能错误地受到刑事追究，这样的被告人当然会喊冤、申辩。真正的罪犯提出依法不应追究刑事责任的情况，或可以减轻、减轻、免除处罚的情节，说明理由，进行辩解，是法律所允许的，有时也是符合实际的。所以，不能一听到被告人的辩解，就主观地认为“犯人嘴里无实话”，不作调查研究，随便否定。对被告人的辩解不进行分折，实际上就完全否定了辩解的证据作用，对查明案件的真实情况是不利的。

总之，被告人的口供，无论是供述还是辩解，都会有真有假。审判、检察、侦查人员要防止失真，就必须特别慎重，需要认真调查研究，决不能轻信。假口供不是

事实，无论怎样精心编造，都会出现漏洞，无法自圆其说。只要依靠群众，反复核对，仔细分析，就不难作出正确的判断。

被告人供述了罪行，如果不能取得其他证据来核査，就无法判明他说的真是假，就没有根据来证明案件的真实情况。如果轻率地单凭口供定案，被告人一翻供，判决就毫无根据。反之，有了可靠和充分的证据，即使被告人不认罪，案件缺少了被告人供述这一种证据，也完全能够证明案件的真实情况，提供认定被告人有罪的事实根据。所以，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只有被告人供述，没有其他证据的，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没有被告人供述，证据充分确实的，可以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

由此可见，是轻信口供，还是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不轻信口供，在刑事诉讼法施行以后，就不只是按照什么认识路线办案的问题，同时也是是否严格守法的问题。

关于拒绝回答权

唐 瑛 孙 统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规定，被告人对侦查人员在讯问时提出的“与本案无关的问题，有拒绝回答的权利”，这是保护被告人合法权益的一项具体规定，具有积极的意义。侦查人员依法对被告人进行讯问，是行使侦查权、查明案情的重要手段之一，是非常重要的。断官司，向被告入讯问，也不能漫无边际，毫无范围。对被告人的一切讯问，必须是为完成侦查目的而提出的与本案有关的问题。因为被告人的供述或辩解都起着据证的作用，向被告入讯问与本案无关的问题，即使被告人做出了回答，对案件也起不到据证作用。所以，讯问与本案无关的问题时，法律规定被告人有拒绝回答的权利。

在司法实践中，讯问与本案无关的问题，过去有过不少的教训。例如，有的侦查人员，出于各种不正当的主观愿望，向被告人提出与本案无关的涉及党和国家机密的问题，造成严重失密、泄密；有的公安人员，明明已经发现错拘、错捕，不是立即释放，而是千方百计要证明自己“抓得对”，东盘西问，非要在被告人的嘴里掏出“有罪”的口供不可，抓不住这个问题，就抓那问题，抓不住“大的”，就抓“小的”问题，结果，应当无罪释放的，放不了，或者留个“教育释放”、“免于处分”的尾巴。上述种种现象，在林彪、“四人帮”横行期间，是屡见不鲜的。《刑事诉讼法》明文规定被告人有权拒绝回答与本案无关的问题，就可以从法律上有力地防止上述情况的发生，保证公民的合法权益。

当然，对于侦查人员提出的与本案有关的问题，被告人是应当作出如实回答的。对于侦查人员的正当的提问，被告人如果假称与本案无关而拒绝回答，对于侦查机关来说，也不是不可克服的困难。因为，侦查机关还可以采取其他侦查手段，获取被告人有罪或无罪的证据。只要掌握了被告人犯罪的确凿的证据，同样可以通过人民检察院对被告人提起公诉，交付人民法院进行审判。《刑事诉讼法》第三十三条同时规定：“没有被告人供述，证据充分确实的，可以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

《刑事诉讼法》中关于被告人有权拒绝回答的规定，要求侦查人员将主要精力放在获取证据上，切实做到以事实为依据，忠实于事实真相。如果侦查人员侵犯了被告人的这一诉讼权利，剥夺被告人的不回答权，被告人有权提出控告。

